

圣 算 格 物

近思录 解新

朱熹曰：「格物者，穷事事物物之理；致知者，知事事物物之理。」



132254.02

1

江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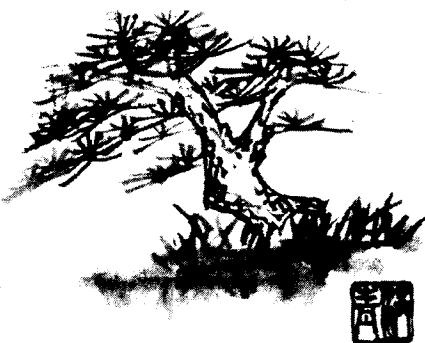
“圣算”经典系列——

原著：朱熹

编译：安平

圣算格物

《近思录》新解

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317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近思录》新解／(宋)朱熹等著；安平编译。—北京：

宗教文化出版社，1997.4

ISBN 7-80123-079-5

I. 近… II. ①朱… ②安… III. 理学—语录—注释 IV. B224.0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22402 号

圣算格物——《近思录》新解

(宋)朱熹著 编译：安平

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崇文区沙子口路 72 号 邮编 100075)

全国新华书店经 销 七二一五工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290 千字

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0001—15000

责任编辑：殷岳 封面设计：明君

ISBN 7-80123-079-5/G·27

定价：19.60 元

总序

(一)

什么叫“圣算”？

知道人的天性，自我修养不会紊乱；把握事物的规律，言行举止不会惑乱。——是为圣算。

察其事情的本源，便能预知其终止；观察一个人的环境住所，便能预知他的回归。——是为圣算。

居处静中，清楚自己所干的事情；行动之中，知道所去的方向；处事了解所执掌的规则；事后明白所做的原由。——是为圣算。

清静恬淡，是圣算的根本；规矩法则，是圣算的依据；圣人的心算思维，是圣算的具体概念；从一个端点出发，而扩散到没有止境之地，是圣算的秉性；遍及八方极远之处，又可以总括于一个洞管之中，是圣算的本能。

人类的文明源远流长，人们的思维启蒙是“数”的初萌。数的运用在字的形成之先，算的演变延展出理的阐述。在中华传统文化之中，是先有“八卦”的卦象和爻象，然后才有《易经》中的卦辞和爻辞。

上古的结绳记事，是数的应用；当代的科学技术，是数的升华。“数”，是“道”的内层，“道”是“数”的软件。“数”是事物本身原本有的，不因人们对它的认知与否而生灭，也不以科学的发达而有所改变。水的分子式是 H₂O，说明水分子的组织结构中有 2 个氢原子和 1 个氧原子。人们发现了这个分子式以后是这

样，上古时代的水也是这样；大海的水是 H₂O，喜马拉雅山的水也是 H₂O；无色的泉水是 H₂O，混浊的池水也是 H₂O。所以说，数是事物原本有的，数即是道，道也就是数；数即是理，理也即是数，数是万事万物的本来面目。万事万物的基本结构也是数的排列组合。

如果把“数”与“道”，“数”与“理”比较来看，“道”与“理”原本来源于“数”，“数”是先天，而“道”与“理”则是后天的；事物的混浊之状本为“数”，使之澄清，显现即为“道”与“理”。而这个使之澄清、显现的就是“算”。算者，演算，推算，谋算，心算也。“数”为体，“算”为用，体用契合显现出“道”与“理”。

道是数的本体，理为道的象体。比如一棵苹果树，结出的苹果是“理”之象，开出的花是“道”之显，能够发芽的种子才是“数”之体。能由果想到花的是普通常识；能由花、果联想到种子萌发的是大知识；如果连苹果的形象也不知道的，那一定是盲人。

再由苹果推及到人生，推及到社会，乃至宇宙万物，同样是一个“种——芽——枝叶——花——果——种”的循环圈，这个循环圈从“数”上解释，即为事事物物原始本有的内部结构，从“道”上解释，则为事事物物的自身规律；从“理”上解释，又为事事物物的表层现象。

由“理”及“道”，是“理”的升华，从“道”及“数”是“道”的回归。升华和回归都是“算”的思维。圣人思维就是超凡脱俗的“圣算”。

由“数”及“道”，是“数”的澄清，从“道”及“理”是“道”的显现。澄清和显现都是“算”的功能。圣人的功能就是施理于数的“圣教”。

圣教的形式是将“圣算”的道理广布于社会，圣教的目的，是使人们都能正确认识自然，认识人生，不断地修正人生，完善人

生，圆满人生，进而超越“自我”。

自我领悟的是“圣算”，启发他人觉悟的是“圣教”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，老子、孔子、庄子、孟子、列子、荀子……，都是圣人，他们的言论就是“圣教”的底本。

(二)

人们不可能天生就能干，不能自己想怎样聪明就怎样聪明。聪慧不是自己有意的结果，愚笨也不是主观的意愿。美不是想美就美，丑也不是想丑就丑。常人如此，圣人也是如此。

木匠会制作门框，但他也只知道制作门而已，却不懂得门从哪儿开。定要先把他关在黑屋子里，并且四面都给严严实实地堵住，然后他才知道该从哪儿打开一个门。

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也是从表象而至本体中来的，只看现象，不深究其里，终不能悟得其中的真谛。对“数”的认识也是如此。

孔子“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”。孔子所指的天命，就是自然变化的内在规律，这些规律正是“数”的排列组合。“知”是“算”的结果，又是“算”的过程。所以说，一部《论语》就是“圣教”的底本，也是“圣算”的结晶。孔子一生施教，讲的就是“天命”的本来面目，就是教学生“算”的技能，“知”的途径。“吾日三省吾身”则是“算”的检验。

孔子说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意思就是说，早晨领悟了事物的真相，看到了“数”的本体，那么，晚上死去都可满足。未得道时，以为生、死是两回事，得了道，即将生与死打成了一片，“生”在“数”的本体之中，“死”也是在“数”的本体之中。人从哪儿来的，还是回到哪儿去吧，没有什么可以留恋和悲伤。一棵大树，生长在那里，郁郁葱葱，蓬勃茂盛，其形大，其质重。然而，一旦伐之、焚之，则只剩下一撮灰烬，其形萎，其质轻。那么，原来的形体和质量又去了何处呢？大凡植物都萌生于当初那

一颗种子，种子吸足了水分，呼吸了空气。萌生出胚芽，萌芽出土，承沐阳光、雨露。其根部吮吸土地中的矿物质和水分，其叶通过光合作用，将空气中的气体变为自身营养。灰烬是矿物质的变异物质，而光合作用中的营养物质仍回归了空气。树是物质，矿物质是物质，灰烬是物质，空气中的各种气体也是物质。大凡物质都是“数”的一合相。“数”的一合相又能演变出千千万万个“一合相”。种子是“一合相”，树是“一合相”，灰烬是“一合相”，气体同样是“一合相”。每一种“一合相”，其数的排列各有异同。人的生与死，只不过是“数”的重新排列，再次组合，由此种“一合相”变为彼种“一合相”，而在“数”的宇宙中，万事万物皆是一“一合相”。

孔子说：“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也；不知礼，无以立也；不知言，无以知人也。”意思是说：不懂得命运，就不能做君子；不懂得礼节，就不能安身立命；不懂得分析别人的言论，就不能了解人。在这里，孔子把“知命”当作君子立身处世的主要条件。

在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里，有这样一位哲学教授，他在讲课前，先请同学们和他一起做“思辩体操”。步骤是：先思辩自己能活二百年的话，要做些什么，怎么去做？大家很从容地放开想去。接着他请大家想一想只能活五十岁的话，要做些什么，怎么去做？再然后，一步步类推到只能活上一天、一刻，问题依然是“要做什么？怎么去做？”到此时，同学们才逐渐紧张起来，第一次感到生命的宝贵，感到许许多多胡思乱想、妄心虚求都已毫无意义，只有把握住以此一线生机去超越尘世的痛苦才最有价值。仿佛第一次感悟到：在历史的长河里，在宇宙的空间里，二百年与一天乃至一刻竟然差别如此微妙。有意义的人生，一刻即百年；无价值的人生，百年不如一刻。这种“思辩体操”是从“数”的游戏入手，而引导学生进入一个“心算”的思维历程，通过“心算”而知生命的可贵，顿悟人生的真谛。

在佛陀《四十二章经》中也有这样一段对话：佛问诸位沙门：“人的生命从生到死相去多远？”有人答：“在数日之间。”佛说：“你没有人道。”又问一沙门：“人的生命从生到死相去多远？”答曰：“在饮食之间。”佛说：“你没有人道。”再问一沙门：“人的生命从生到死相去多远？”答曰：“一呼一吸之间。”佛说：“善哉，你可称得上为道的啊！”这里，佛陀突出强调了从生到死并不遥远，向世人发出了警策。如此知命境界和睿智，为世人树立了“圣算”的典范。

不知孔子当年同弟子们有无这样的对话和思辩，但他能把“知命”作为君子立身处世的首要因素，足可见：古今圣人之见略同。岂是“略同”而已。

(三)

说到孟子的“先知”，依然是一个知命的课题。

一天，周成王同大臣们闲话。他忽然想到一个问题，问鬻子道：“寡人听说：‘圣王处在上位，能使百姓发家致富，又能叫他们都长命百岁。’我看这话只对了一半。使百姓都富起来嘛，这容易办到，至于寿命之长短，这怕要由天命吧？”才华出众的鬻子，不假思索地回答道：“陛下想使百姓都富起来并能长寿吗？这是能够办到的。”成王高兴地笑道：“那好，你说说看！”鬻子从容答道：“圣王处在上位，天下太平，国家没有用兵之事。各路诸侯皆各安其所，不争不斗。百姓们也都安安生生，没有相互斗殴之事发生。能如此，老百姓都得到了尽情享乐的第一条命了。”成王问答：“什么？难道生命还有第二条吗？”鬻子轻轻作了一揖，说道：“有的！大王，请听我说：圣王在上，积德化民，民皆尽力，女的忙着去制衣，男的忙着去种田，人人都不受冻、不挨饿，这就得到第二条命了。圣人在上，施行仁政，官吏爱民如子，民皆归顺，用不着执行刑罚，青少年们不会遭屠杀，人民就得到第三条命了。圣

王在上，使民有时，用民有节，有劳有逸，劳逸结合，百姓都很少生灾害病，自可延年益寿，这就是得到第四条命了。有了四条命，这不就是长命百岁吗？”成王听了哈哈大笑道：“是这样，是这样，寡人从今天开始就学做这样的圣王。”鬻子这番连珠炮似的推算，又从另一个视角精辟地说出了民之寿命与君命的关系。

孟子在《尽心上》中说：“能够竭尽他的善心的，便是真正了解了人禀受于天的善性。懂得了人的善性，便是懂得了天命。（一个人）努力保存他的善心，培养他禀受于天的善性，目的就在于正确对待天命。不管短命或是长寿都毫不怀疑动摇，只是修身养性以等待天命的抉择，这便是用来安身立命的方法。”

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篇中说：“应该长久地与天命相配，寻求更多的幸福。”《太甲》篇中说：“老天降下的灾祸还可以想办法逃避，自己造成的罪孽，就逃避不掉。”孟子引用这两段话时说：“祸害和幸福没有不是自己造成的。”在孟子的心算思维中，人在“天命”之中不是被动的、消极的、无能为力的。圣人的心算哲思，明白地告诉世人：财富只有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，命运只有靠自己的智慧去主宰。

（四）

子思问孔子道：“物质有形状类别之分，事情有真假之辨，一定要审察明白，凭什么去明辨呢？”孔子道：“凭心，心的精神即是圣，推演规律，探究道理，不为事物表象所迷惑，全面地考察明辨事物的本质，虽然是圣人也不是容易做到的。”

孔子认为审察事物，明辨真伪，应该“凭心”。用自己的心理推演去探究道理。“心的精神即是圣”。圣人的心理演算即是“圣算”。

阳明先生的“致良知”学说都贯穿在他的著作《传习录》中，我们可以从书中去探究心学者“致良知”的圣算思路。

所谓“致良知”，其根本宗旨就是要确立自我主体性，自信自决，破除一切神圣不可犯的教条和偶像，直接去做开天辟地、建功立业的圣人，而不是做任何外在权威的奴隶。阳明说：“人胸中各自有个圣人，只自信不及，都自埋倒了。”并对弟子说：“尔胸中原是圣人！”做惯了圣人之奴隶的弟子慌忙站起来，不敢承当。阳明说：“此是尔自家有的，如何是推？”弟子仍说：“不敢。”阳明复道：“众人皆有之，更况在汝！却何故谦起来？谦亦不得！”弟子只好笑而承受。人人皆有天赋的良知，只此良知便是判断一切是非善恶的标准，任何伟人、圣人都要接受自我良知的审判。

阳明说：“天理在人心，亘古亘今，无有终始，天理即是良知。”“良知是天理之昭灵明觉处。”“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，是非只是个好恶。只好恶，就尽了是非；只是非，就尽了万事万变。”“若是良知发用之思，则所思莫非天理矣。”

阳明指出，只要能致良知，就能“看得透彻，随他千言万语，是非诚伪，到前便明，合得的便是，合不得的便非。如佛家说‘心印’相似，真是试金石，指南针！”有了这个良知，便不会被任何权威和偶像所迷惑，便可以洞彻其是非善恶的本质。那么，如何致此良知呢？要解心中之蔽。人心是天渊，只为私欲窒塞了，“念念致良知，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，则本体已复，便是天渊了。”心即道，道即天，知心则知道、知天。要见此道，须从自己心上体认，不假外求始得。“吾辈用功，只求日减，不求日增，减得一分人欲，便是复一分天理。”不要一味地“从册子上钻研，名物上考索，形迹上比拟，”如果心术不正，则“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，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。”天理与私欲不能并立，须有扫除廓清之意，“才有一念萌动，即与克去，斩钉截铁，不可姑容。”善便存，恶便去，这便是格物的真诀，致知的实功，王阳明的心学“圣算”。

(五)

朱熹的“圣算”是“格物”。

“所谓格物，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，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。

首先，“大而天地阴阳，细而昆虫草木，皆当理会；一物不理会，这里便缺此一物之理。”

其次，“格物，为人君止于仁，为人臣止于敬，事父母则当敬孝，处兄弟则当尽其友，如此之类。”

“如今说格物，只晨起开目时，便有四件在这里，不用外寻，仁、义、礼、智是也。”

朱熹认为，“欲养其知者，惟寡欲而已矣。欲寡则无纷扰之杂，而知愈明矣。”他说：“致知，乃本心之知，如一面镜子，本全体通明，只是被昏翳了。而今逐旋磨去，使四边皆照见，其明无所不到。”关于格物与致知的关系，朱熹说：“致知是自我而言，格物是就物而言。”“格物以理言也，致知以心言也。”“格物是逐物格将去，致知则是推得渐广。”“格物是零细说，致知是全体说。”其实，“致知格物是一事。”“格物者，穷事事物物之理；致知者，知事事物物之理，无所不知，知其不善之必不可为。”总之，致知是为了穷理，而穷理又须从格物开始。”
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“格物”最为典型者当为品茶。中国人饮茶自传说神农尝百草时起，迄今已三千年左右了。茶起初为药用，后为饮用。从朝廷的贡茶，到百姓开门七件事的“柴米油盐酱醋茶”，广东，福建的功夫茶、云南少数民族的三道茶、北京的大碗茶及寺院的击鼓饮茶等，无一不显示出茶的文化内涵，及其独特的传统精神，即《茶经》中具说的：

“酸甜苦辣调太和”的“中庸之道”；

“朴实高雅去虚华”的“行俭之德”；

“奉茶为礼尊长者”的“明伦之理”；

“饮罢佳茗方知深”的“谦和之行”。

饮茶具体地说可以分为两个范畴。其一为形而下的煮饮、品尝的生活化行为；其二则为通过茶这一特殊媒介来追求形而上的精神世界。换句话说，一般的饮茶，是为了消渴、解乏，而品茶则是对“茶”的“致知”、“格物”、“圣算”。因为从神农尝百草识茶、到用于药、饮而用茶、到宫廷、僧侣、文人墨客品茶。识茶——用茶——品茶的延展过程，正是人们长期以来共同“格物”所“致”的“知”。此“知”即茶的文化也。茶文化中，有茶诗，茶联、茶乐、茶舞、茶经、茶书、茶艺、茶具制作等艺术形式，其中饱含了儒、道、佛等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，与陆羽并列为“茶圣”的诗人卢仝，从一碗茶中“格物”，而感受到通往人与自然的融合——游玩于三昧，除虑净尘的过程——

一碗喉吻润，

二碗破孤闷，

三碗搜枯肠（唯有文字五千卷），

四碗发轻汗（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），

五碗肌骨清，

六碗通仙灵，

七碗不得吃也（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）。

这里不是品诗，亦不是品茶，只是借茶赏诗，借诗“格物”，借物推理，借理“致知”而已。

(六)

前文讲到：“数”是宇宙万物的本原，“数”的显现即为“道”，“道”的诠释是为“理”。然而，这种延展只是一个方面，另一方面则是“数学”的产生和发展。

数学，是研究“数”的一门纯学科，也是人类认识自然、征服自然的一门基础学科。如果把她称为自然科学的母体学科，当

不为过。

东方人有东方人的数学，西方人有西方人的数学。有人说：西方数学是抽象的抽象，是有限的；东方数学是具体的抽象，是无限的。西方数学中每道算式只能有一个正确答案， $1+1=2$ ，决不能等于3。而东方数学则不然，它具体到用“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”五行来代表“数”的演化，一金加一木，一木加一木，答案不一定等于二。所以，它又可以抽象到用“爻”和“卦”来演示数的变易。爻象中有“—”和“—”，但它们却演示出了“八卦”和“六十四卦”卦象，而每一卦，乃至每一爻，又都各各象征了自然、社会、人生中的无穷变化。

所以，东方数学能与东方的文字结缘，在东方先圣、先哲们的思维中，“—”可以与“道”同一概念，同一合相。在东方圣贤的智慧中，“数”是抽象的程序又是具体的思维。

古人云：人有千算，天只一算。天算的依据是“天数”。什么是天数：一年四季的交替，月亮的朔望，海水的潮汐等等，都是有定数的，有其固有程序的。整个宇宙亦有一个总的程序，这个总程序便为“天数”。圣人的“人数”不违背“天数”，是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是“天算”，也就是“圣算”。他们“穷理尽性以至于命”，不象一般人对自身命运的定数无可奈何，对自然界的定数听天由命，因为圣人知道运用“圣算”，如何改变自身的定数。古之《易经》和《道德经》就是教人“圣算”的真经，“八卦”就是教人“圣算”的符号。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告诫曰：“善数者不用筹策。”（善于计数的，用不着竹码子）。庄子云：“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。”《黄帝阴符经》云：“观天之道，执天之行，尽矣。”“是故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，因而制之；至静之道，律历所不能契。”“人知其神之神，不知其不神之所以神也。日月有数，大小有定，圣功生焉。其盗机也，天下莫能见，莫能知。”这里所讲的“律历”、“数”，就是《尧曰篇》所说的“天之历数”。

每个人的先天气数并非不可改变，以“圣算”的思维方式去顺应自然的“天数”，个人的气数便能得以涵养和充气。所以说《阴符经》是“圣算”的玉诀。

(七)

列子说：“‘易’（道）没有形状，没有迹象。易化而为一，又由‘一’衍变为‘七’，‘七’衍变为‘九’。‘九’是气的变化的终结，又反过来变为‘一’。‘一’是形的变化的开始。”

说到“数”，列子把它比作“无”，并列举了“无”（数）的专职：“能够阴，能够阳；能够柔，能够刚；能够短，能够长；能够圆，能够方；能够生，能够死；能够热，能够凉；能够浮，能够沉；能够唱宫，能够唱商（“宫”和“商”都是古代的音符）；能够出水，能够沉底；能够黑，能够黄；能够甜，能够苦；能够膻，能够香；它们无知无能，却又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”

《列子·周穆王第三》中还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：老成子向尹文先生学变化莫测的幻术，三年之久不曾教过一次。老成子请问自己错在哪里，请求退学。尹文先生向他作揖，引他到里屋，避开别人对他说：“从前老聃往西去，回头告诉我说：“一切能吐能纳的气，一切有形状的物体，全是虚幻不真实的。”自然中所开始的，阴阳所变化的，叫做生与死；气数尽了，该变换了，于是有了各种形状体质的变化，叫做幻，叫做化。懂得幻化和死生没有什么质的差别，这才可以学习幻术了。我和你也是幻化，何必再学呢？”老成子听了便回家去把这番话尽力思考了三个月。于是能够或隐或现，自由自在；又能播弄四季，冬天可以打雷，夏天可以结冰，飞的可以使它跑，跑的可以使它飞。……

可见列子对于“数”的见悟。所以他说：“若使聪明的人计算利害，估量虚实，揣度人情，所得一半，所失也一半。不太聪明的人，不计算利害，不估量虚实，不揣度人情，所得一半，所失

也一半。计算和不计算，估量和不估量，揣度和不揣度，有什么不同？只有无所计算，无所估量，就完全成功而没有失败。也不是知道完全，也不是知道丧失。自我完全，自我消失，自我丧失。”

列子的结论是：无论是“天算”、“圣算”，还是“人算”，最彻底，最自在的还是“无算”。“天算”胜“人算”，“无算”胜“天算”。

(八)

本系列称为“圣算”系列，也许会引起许多责难。如果真有“责难”，便是我们所期望的。中华传统文化中，有取之不尽的财富，各人在挖掘中所取得的只能是其中的一点点。然而，即使是这“一点点”，也够我们好好思索，好好为人了。

诚恳地希望，垂慈赐教！不胜感谢！

主 编
1997年3月于北京西罗园

概 述

(一)

南宋淳熙二年（1175年）四月，39岁的吕祖谦，从浙江来到福建与46岁的朱熹会晤。二人在“寒泉精舍”相与苦研周敦颐、二程、张载的著述，深感其内容“广大闳博、若无津涯”，初学者不易把握其要义，于是商讨编辑一本理学入门的书。书中精选622条，分为14卷，书名定为《近思录》。“近思录”是切问而近思之意。孔子在《论语·宪问》中说：“切问而近思”，意思是就眼前的问题思考，由近而及远，下学而上达，不废四阶，循序渐进。他们把《近思录》当作学习四子（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张载）著作的阶梯，四子著作又为学习《六经》（易经、读经、书经、礼经、乐经、春秋）的阶梯，以正“厌卑近而鹜高远”之失。

(二)

由上观之，《近思录》是为四子著作的注本。所以，这里不能不对南宋四学子及他们的学说作些介绍。

周敦颐（1017～1073），字茂叔，原名敦实，避宗英宗旧讳改，道州营道县（今湖南道县）人。他曾建书堂于庐山麓，堂前有溪，仿其乡里濂溪之名，命名濂溪书堂。晚年定居于此，后人称之为濂溪先生。15岁丧父，随之到京师（开封）投靠舅父龙图阁直学士郑向。少年时代，是在郑向的抚养下度过的。24岁任洪州分宁县主簿，政绩颇佳。1044年，调任为南安军通判处。1046年，与二程的父亲程珦（当时任大理寺丞）相识，程以周为“知道者”而结为好友，并令二程受学于周。程颐在《明道先生行状》中回忆说，其兄程颢，自十五、六岁时，听周敦颐论道，“遂厌弃科举之

业，慨然有求道之志”。可见，周敦颐对二程日后的理学道路是有重要影响的。周敦颐历任县令、知州、太子中舍，签书署合州判官事。他在合州做官四年，政绩显著，颇有声望。解职回京时，铜梁县令吕陶有序相赠曰：“春陵周茂叔，志清而材醇，行敏而学博，读《易》、《春秋》探其原，其文简洁有制，其政抚而不柔。”后迁往国子博士，通判虔州；又摄邵州事，在邵大兴学校，教育后学，自认为是复兴孔学的一代大师。1068年，吕公著推荐为广南东路转运使，提点刑狱。1072年，因病乞休知南康军，遂定居庐山莲花峰下。1073年6月7日病逝。周的著作不多，今有《太极图·易说》、《易通》数十篇，诗10卷流传，后人编为《周子全集》，亦称《濂溪集》。

朱熹在《伊洛渊源录》中称周敦颐为理学开山大师。其门人魏了翁在上宗宁宗疏中称周为“嗣往圣，开来哲，发天理，正人心，使孔孟绝学，独威于本朝，而超出百代，功用所系，治理所关，诚为不小。”周的《太极图·易说》、《易通》成为理学的不刊经典，甚至被比作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。周敦颐的宇宙观、人性论、道德论、教育论、政治论等，都体现在他所提出的无极、太极、阴阳、五行、动静、性命、善恶、鬼神、死生、礼乐、诚、无思、无为、无欲、几、中、和、公、明、顺化等等，为日后的理学家所反复讨论和发挥。特别是程朱的理学，程颐的“理生气”说，正是从周敦颐的“自无极而为太极”的“虚生气”说发展而来的。对程颢、王奇石、张载及至后来的王廷相、罗钦顺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

周敦颐的理学思想是道教思想与传统儒家思想的混血产物，并间杂有佛教思想。《太极图》来自道教，《易通》发挥了《中庸》的思想，二者又都用“易”义作为包装，构筑了周敦颐自己的理学思想体系，同时，也确立了他“理学开山大师”的地位。

二程，即程颢、程颐。